

德国新总理内政外交有何亮点?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郑春荣

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8日当选为德国新总理,与前总理默克尔正式交接。10日起,他先后对法国、欧盟总部、北约总部和波兰进行访问。15日,他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上任后首份政府报告,阐释新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推动能源转型、加强欧洲团结等方面的政策。德国新总理在内政外交以及对华政策上有些什么亮点?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分析。



郑春荣

1 内政:强调“勇于进步”

问:德国新总理朔尔茨15日发表首份政府报告,德国新政府在内政方面有哪些计划?

答: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三党联合政府,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核心诉求已然反映在它们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标题上:“勇于进步:自由、公正与可持续发展联盟”。朔尔茨15日发表的首份政府报告,也凸显了这个自称“进步联盟”的新政府计划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对于朔尔茨政府而言,如何尽快控制住德国第四波疫情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为此,朔尔茨强调,新政府建立了“危机小组”来更好地应对疫情,而且他特别强调要加大疫苗接种力度,目标是到年底前完成接种3000万剂疫苗。

新政府能否实现“进步”,尤其体现在能否实现德国社会的绿色化和数字化双重转型上。新政府计划加速退出煤电,原定的2038年退出在理想状况下将提前到2030年。在推动能源转型的框架里,新政府计划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从当前设定的65%提高到80%。在气候保护主流化的背景下,新政府将在2022年推出气候保护应急计划,并对每一项立法计划从气候中和的角度进行审视。与此同时,新政府还将推进数字化进程,目标是实现光纤在德国全覆盖。与绿色化进程一样,德国未来每一项立法计划也要从数字化角度进行审视。

鉴于疫情加剧了德国社会的平

平等状况,朔尔茨在政府报告中特别提到社会团结的重要性。新政府也在提高社会福利方面提出许多举措,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社会保障住房、确保养老金水平不下降等。朔尔茨在政府报告中使用最多的词是“启程”与“进步”,雄心满满地细数了新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达成的举措。他鼓励德国民众拿出勇气,为新政府即将启动的“百年来最大的产业和经济变革”作好准备。应该说,政府报告体现了朔尔茨一贯的务实作风。

对新政府有利的是,前总理默克尔执政的16年被德国舆论认为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上的投入相对滞后,给了新政府施展身手的空间。但是,新政府能否顺利实现这些目标,仍然需要观察。

在组阁谈判时,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均表现出强烈的执政意愿,因此,组阁谈判并未如预期的那样旷日持久,而是在选后73天就顺利组成了新政府。不过,随着新政府执政的展开,三党之间这种良好的“化学反应”能延续多久,依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无论是绿色与数字转型,还是社会福利水平提高,都需要资金的保障,但是新政府仍承诺不放松财政纪律,坚持恢复“债务刹车”,因此,如何实现这两方面的平衡,考验着朔尔茨政府的智慧。尤其是新政府能否尽快控制疫情并尽快实现疫后复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政府未来的行动空间。

2 外交:更加积极有为

问:朔尔茨上任伊始就完成了首次出访,他是否会延续默克尔时代的外交政策?

答:无论是《联合执政协议》还是政府报告,都表明德国新政府的工作重心将放在国内事务上。但是,这并不能遮蔽新政府在对外事务上的雄心。显然,新政府意欲延续默克尔政府时期推行的积极有为外交,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依然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两根支柱。

从朔尔茨首次出访选择的路线,也可以看出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着力点。依循惯例,朔尔茨出访的第一站是法国,旨在彰显德法之间的传统友谊,以及法德轴心对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作用。朔尔茨在布鲁塞尔与欧盟机构领导人的会晤,同样释放了德国新政府将坚定不移致力于增强欧洲的信号。

不过,在当前离心力上升的欧盟内,尽管德法合作不可或缺,并不能掩盖两国的分歧。例如,德国决定

到2022年退出核电,而法国视核电为绿色能源;德国新政府不愿放松欧洲的财政纪律,法国则希望放宽财政稳定方面的标准。因此,朔尔茨和马克龙还需要磨合,以便达到默克尔和马克龙曾达到的默契程度。

朔尔茨也认识到,在目前的欧盟内,光靠法德轴心已经无法确保欧盟项目顺利推进,因此有意寻求与欧盟其他国家携手。例如他访问意大利,并计划与意大利订立加强合作的行动计划,很好地呼应了法国与意大利签订友好条约、欲增强法德意三方在欧盟内作用的意图。

与此同时,朔尔茨在政府报告中特别提到与波兰关系的重要性。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新政府强调要推动德国、法国和波兰之间的“魏玛三角”机制。不过,这样的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也笼罩在阴影之中。因为欧盟与波兰之间在法治国家原则问题上正在较劲,欧盟认为波兰的国内改革违反欧盟的法治国

家原则,考虑暂停对波兰拨款。

朔尔茨首访将波兰列为一站,显然是想充当欧盟与波兰之间的调解人。但尽管朔尔茨此行意在突出德波两国友谊,同样不能掩盖双方在“北溪-2”项目等问题上的分歧。而且,德国新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将致力于推动一个对内对外捍卫其价值和法治国家原则的欧盟。显然,德国新政府作为欧盟与波兰冲突调解人的回旋余地有限。

与默克尔政府相比,德国新政府表现出加强与美国协调的意图。朔尔茨在政府报告中强调,美国与北约对于德国的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他在北约总部访问时,也表达了增强德国武装力量并为北约安全保障作出自身贡献的意愿。但是,对于提高防务支出,他只是笼统表示将在“预算可能性的框架里”提高,并未就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作出承诺。显然,德国新政府延续了默克尔政府的立场,即认为所有为解决危机和冲突而采取的外交、防务和发展政策的支出,都应被纳入2%计算范围内。

3 对华:继续务实合作

问:朔尔茨在政府报告中提到对华合作,德国对华政策是否会变?

答:欧盟在2019年的《欧中战略展望》中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与制度对手,德国新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延续了这样的定位,而且依然把合作伙伴置于三重角色的首位。然而,《联合执政协议》也强调与中国的高科技竞争与制度对抗,似乎显示出新政府将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态势。

不过,朔尔茨的首份政府报告释放出的信号是,新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默克尔政府的对华务实合作政策。他在政府报告中强调,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国际上拥有重要的地位,对华政策必须与实际相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气候问题、疫情危机和军备控制等全人类

面临的挑战方面需要与中国合作”。

显然,这一表态与强调在外交政策中要展现“对话与强硬”的德国新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不同。后者意欲推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但这一政策在德国国内并无共识,连反对党也提醒他尊重现实,在对外政策中维护德国经济界的务实利益。中德关系中的一个实际情况是,即使在疫情背景下两国经贸合作也在逆势上扬,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德国新政府释放出的另一个信号是,将更加致力于欧盟统一的对华政策。特别引人关注的是,《联合执政协议》要求中德政府磋商也“更加以欧洲为导向进行设置”。这意味着,德国未来在与中国举行政府磋商前,会与欧盟加强预先沟通。以

往,德中之间的政府磋商会被欧盟其他国家指责为仅仅服务于德国利益,而没有顾及欧盟的共同利益。如今德国更多地主张在欧盟框架里与中国交往,不仅可以打消欧盟其他国家的质疑,而且在德国看来,欧盟国家之间抱团可以使欧洲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

德国对华政策“欧洲化”的日益增强是把双刃剑。如果德国在欧盟内施展积极的正向力量,无疑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德关系对中欧关系的引领作用。但是,如果德国新政府更多地受到美国联欧制华战略的影响,而在欧盟对华政策上发挥负能量,则会给中欧关系带来更大困难。

好在,朔尔茨在首份政府报告中传递的对华政策表明,德国新政府将继续推动中德之间的务实合作以及在全球性事务上的协调,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中德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保持一份期待的态度。

安倍晋三下台后仍热衷于抛头露面为哪般?



王广涛 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在2020年9月辞掉首相一职后,安倍晋三并没有彻底退出日本的政治舞台。如今,成为自民党“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会长的他,在各大场合出镜的频率丝毫不亚于现任岸田内阁的阁僚,甚至首相岸田文雄本人。虽然公开表示支持岸田的工作,但安倍又通过各种方式“唱反调”或变相施压岸田,甚至在涉华问题上屡屡大放厥词。

安倍这般热衷于抛头露面,在中日间挑起事端的背后,不仅有政策理念差异的因素,还有他所在派

阀以及他本人的政治算计。

仍稳坐第一大派阀

今年10月举行的众议院大选,让自民党各大派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安倍所在的“细田派”虽然减少了10名议员,但是仍然稳坐党内第一大派阀的位置。安倍就任派阀会长后,“细田派”随之变成“安倍派”。“岸田派”(宏池会)在自民党内则是第四大派阀,派阀中众议员数量不及“安倍派”的一半。

安倍虽然卸任首相已经一年有余,却仍然希望在关键议题上发挥影响力。而岸田一方,如要稳定执政地位,除了推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之外,还需要赢得自民党内各派阀的政治支持。

此岸田已非彼岸田

只是,如今的岸田已非当初的岸田。

或许是政治理念上的差异,又或者是政治博弈的逻辑使然,岸田与自民党副总裁、第二大派阀(志公会)领袖麻生太郎,以及自民党干事长、第三大派阀(平成研究会)领袖茂木敏充开始频繁接触,这些举动被外界解读为制衡安倍的表现。进入12月以来,岸田内阁逐渐进入正轨,内阁支持率也水涨船高。

而安倍在担任首相期间留下的“加计·森友学园”“赏樱会”等案底,反倒让岸田在应对来自安倍的压力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岸田在当选自民党总裁以及首相之后,安倍有意愿向岸田输送亲信担任党政要职,但岸田并没有全盘接受,招致安倍的不满。而即便“安倍派”出身的松野博一最终出任内阁官房长官,但他在岸田内阁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党政高层中的协调力,与前首相菅义伟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特别是在赢得众议院选举之

后,岸田“脱安倍”的进程得以加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任命本派阀出身的林芳正为外务大臣。

因为选举区可能合并,安倍与林芳正或许会在未来为争夺议员席位展开竞争。与此同时,林芳正曾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安倍及其家族却有着“亲台”的政治基因,可以想见安倍对此任命的不满。

不甘寂寞一心为己

安倍自然是不愿甘于寂寞的。

一方面,他插在岸田内阁的胞弟岸信夫频繁利用任防卫大臣职务之便,在政府内部替台湾发声;另一方面,安倍本人则利用前首相的身份以及自民党最大派阀领袖的影响力为台湾站台。最近在出席台湾一家智库论坛时,安倍甚至放言“台湾出事”就是“日本出事”。12月8日安倍与高市早苗共同出席“保守团结之会”讨论会时,两人更是如唱双簧一样呼吁日本政府对北京冬奥

会进行所谓“外交抵制”。

事实上,对华政策的好坏并不是安倍最关心的事项。对华政策的背后,是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捞取足够的政治资本。安倍能否“晋三”姑且不论,从执政经历不难看出他是“不甘寂寞”的政客。所以,利用中国问题迎合日本国内的反华情绪,牵制当前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既可以满足他的政治野心,又消费了日本民众的厌华心理,同时还让他在日本舆论占据了所谓“政治正确”的制高点。

当然也应该看到,虽然岸田和安倍在对华政策上有些许差异,但是自民党内部对中国警惕以及牵制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共识,所以没有必要放大安倍与岸田二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但安倍等人利用中国问题来向岸田施压的确是客观事实。

中国当前要做好的是“以不变应万变”。